

特别策划 “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⑩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妇女事业迎来新纪元

·编者按·

■ 胡桂香

新中国成立后，妇女事业迎来新纪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在社会各领域的参与，领导妇女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使妇女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和自己的主人；动员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妇女经济地位大幅提升；完善相关政策规划，妇女参政议政取得长足进步；保障妇女受教育权利，妇女教育事业全面发展。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妇女事业迎来新纪元，全国积极开展反封建运动，清除残害妇女的封建遗毒；开展婚姻法宣传，提升妇女的主体地位；开展扫盲运动，提升妇女素质；开展普选运动，推动妇女走上政治舞台。从1949年到1978年的30年间，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参与，使妇女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家庭和自己的主人。

全面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妇女经济地位大幅度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国际上面临帝国主义威胁，动员全国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成为首要工作。毛泽东强调，“中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而对于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不仅社会上仍有传统偏见，连妇女自身也存在思想障碍，许多妇女不愿下地劳动，认为“相夫教子”才是正统。在此背景下，党主要从两方面着手来发动妇女参与社会化大生产。

一是进行思想动员，挖掘各阶层妇女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宝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思想、毛泽东妇女解放思想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对全国妇女开展了广泛动员，尤其是各地妇联组织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配合人民政府在农村妇女中开展了“劳动光荣”的思想教育。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60%的中国妇女就已走向社会，参加经济建设；到了1958年达103.6万人。1960年“大跃进”期间，90%的妇女参加了社会生产劳动。据统计，1957年，全国女先进工作者人数为10.2万人，1958年增加到28.1万人，1960年达103.6万人。1960年，全国妇联表彰的“三八红旗手”和女劳模有10002名。在各行各业，新中国妇女勇创多个“第一”：1950年，以梁军为队长的中国第一个女拖拉机队成立，田桂英等8名青年女工成为中国第一批火车司机；1953年，新

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飞机飞过天安门上空；1955年，子弟兵母亲戎冠秀、全国劳模申纪兰、植棉模范张秋香、老赤卫队长李友秀等作为农业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登上《人民日报》的社论；1964年《人民日报》刊发了题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文章，明确指出妇女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二是实行同工同酬与“耕者有其田”，保障妇女的经济权利。有学者指出，“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实行鼓励妇女全面持续就业的政策，具体包括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必须参加社会劳动的重要思想；指导制定针对妇女就业特点的法律政策；指导支持妇女就业的社会生育保险体制；实行促进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有效措施。”土地改革后，承认“耕者有其田”而不再区分男女，女子同样有土地分配权。毛泽东明确提出：“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使妇女能够获得同等的酬劳，使妇女能够在农村地区分配到自己的土地。”经济政策的颁布极大地激发了妇女群体的生产动力，推动妇女取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在发动和组织妇女参加生产的同时，也注意保护妇女的特殊利益与特殊需求，如照料子女、家务劳动及特殊的生理情况，根据实际情况予以解决，促进了妇女劳动的积极性。

完善相关政策规划 妇女参政议政取得长足进步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妇女参政议政取得的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妇女作为公民行使公民权利，积极参加基层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建立，广大妇女积极参加各地的选举，她们称选票为“当家证”。1953年12月，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普选中，90%以上的妇女参加投票，当选为基层人民代表的妇女占代表总数的17%。就女干部而言，1956年，全国范围内的女干部数量已上升到108.85万人，此后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61年增至141.24万人，1964年增至161.88万人，占干部总数的18.07%。同时，参政妇女的数量有显著提高。例

如连续三届全国人大女代表数量成倍增加，从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大150名女代表、5名女常委到第三届全国人大时跃升至女代表542名，女常委20名、第四届时有女代表653名，女常委42名。在农村合作社中，女社长的比例达50%以上。

第二，妇女走向国家高层权力机构，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委员会产生了当时新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行政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其中女委员12名，女常委4名，第二届、第三届女常委分别是20名与42名；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机构中，副部级以上领导干部500名，其中女性有20名，分别担任26个职务。

第三，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妇女参政的法律政策。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政策以男女平等为立法原则，明确规定了妇女的各项政治权利。如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上拥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夫妻双方均有选择职业、参加工作和参加社会活动的自由；195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及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均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法律对妇女政治地位的确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妇女的参政热情和主人翁意识。

充分保障妇女受教育权 妇女教育事业得到全面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妇女教育在起点、过程与结构方面有了明显的发展。

首先，开展全国性的扫盲教育。毛泽东指出，“没有扫除文盲，没有进小学、中学、大学，妇女还不可能彻底解放。”1949年，政府成立了专管扫盲教育的识字工作委员，大规模的扫盲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经历了1952年、1956年和1958年三次扫盲教育运动，1600万妇女摘掉了文盲的帽子，广大妇女，尤其是女工、女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素养显著提升。

二是女童初等教育的性别差距逐步缩小。新中国成立前，学龄儿童入学率只有20%，且男童入学率大大高于女童。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采取比较灵活的办学政策，使初等教育获得较大发展，越来越多的女童进入小学接受教育。比如，中央采取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社会办学并举的方针，鼓励群众办学，为学龄儿童上学创造机会。一些地方通过半日制班、午班、夜班、女青少年班，巡回教学、允许带弟妹上学等多种方式为女童入学营造条件。1952年，全国小学数量达52.7万所，小学女生数达到1679.7万名，占全部学生数的32.9%；1957年，全国小学女生数达2215.9万名，占全部学生数的34.5%；1958年，全国小学女生数达6570.4万名，占全部学生数44.5%。

三是妇女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不断上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扩大普通中学办学规模的过程中，注重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女性接受职业教育的比例大大增加。1951年，教育部召开全国中等技术教育会议，提出培养大批具有现代文化知识，掌握现代技术的初、中级技术人才。1978年，教育部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从单一的普通中学教育体系转变为与职业教育并行。一大批女子中等职业学校和女性特色专业建立、开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量的中等职业教育女性人才。

四是妇女接受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的机会不断增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高度重视为已完成学校正规教育(或中途辍学)、走上各种社会工作岗位的成人提供继续教育机会。广大妇女通过参加识字运动、互助互学、业余学校等方式参与成人教育，妇女扫盲教育、妇女干部教育、女工教育等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1950年到1954年，全国共建立工农速成中学87所，招收工农干部6万余名，其中包括许多女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同时加大了妇女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通过各种培训方式，帮助城镇妇女提高职业技能，促进农村妇女增收致富。

(作者为湖南女子学院教授，湖南妇女研究会副秘书长)

主持人：李黎阳(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艺苑映像

安妮·阿尔伯斯：领悟艺术就是相信一个常数



在艺术史上，有许多相携而行的艺术家伉俪，他们彼此激发、相互成就。然而，人们在羡慕他们志同道合的同时，也发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所有的艺术家夫妻中，妻子的声名与地位几乎都被她们的丈夫所遮蔽，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妻子的艺术是作为“附属品”被书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艺术观念的更新，她们的个人成就以及在艺术史上的重要性才逐渐得到肯定，在晚年或离世后又重新得到策展人和批评家的关注。安妮·阿尔伯斯(Anni Albers，



▲《城市》，作于1949年
▲《牧场》，作于1958年

1899—1994)便是这样一位曾被低估的女艺术家。安妮是由包豪斯培养的艺术师。在此之前，她曾师从印象派画家马丁·勃兰登堡画过几年画，还在汉堡艺术学院学习过两个月。当她于1922年4月进入包豪斯时，这所艺术学院刚刚成立3年。当时正值德国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在自由多元的氛围中，包豪斯的艺术大师们怀着理想主义抱负，试图通过高品质的设计融入日常生活，从而改善艺术与社会的联系。这里必须提到的是，包豪斯成立与德国妇女获得选举权恰在同一年，因此最初申请入学的女性甚至多于男性，男女平等似乎正在成为现实。然而，即便在

这样的前卫艺术学校，也仍存在着明显的性别歧视。重视创造性的绘画、建筑和雕塑等专业仅提供给男生，而女生只被允许选择编织、陶器和装订这样的实用学科。安妮在完成必修课程之后，不情愿地开始学习编织。当然，包豪斯留给她的也不仅仅是“委屈”的记忆，她在那里还遇到了共度一生的人。在一个圣诞夜，当装扮成圣诞老人的前任校长、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递给她一份约瑟夫·阿尔伯斯精心挑选的礼物后，她和约瑟夫便成了情侣。两人在1925年结婚，并随包豪斯一起搬到了德绍，那时的约瑟夫已被任命为包豪斯大师。

包豪斯鼓励实用工艺与创造性想象力的结合，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几何的力量在混乱的社会现实中重建秩序。怎样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这是安妮当时反复思考的问题。她开始尝试新的编织材料，并很快掌握了双面和提花织机的技巧。她将保罗·克利那里学到的色彩理论用于创作，潜心研究色彩和形状、比例和节奏，使用对比色的、纵横交错的几何图案设计作品，成为一位实验性的抽象艺术家。为了配合新校长汉内斯·迈耶对于包豪斯新的功能定位，安妮也开发了许多功能独特的纺织品。1930年，安妮将黑白线当时的新材料透明玻璃纸和天鹅绒般的雪尼尔交织在一起，为校长设计的贝尔瑙ADGB工学校礼堂墙壁制作了一种隔音和反光墙纸。她因这项创新工作获得了包豪斯文凭，并于次年接替贡塔·斯托尔茨成为编织车间的负责人。1933年，包豪斯在纳粹党的压力下关闭，身为犹太人的安妮与丈夫

一起逃往美国，共同在北卡罗来纳州黑山学院任教。他们将包豪斯的艺术教育理念带到了这里，培养出一大批重要的美国现代艺术家。二人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9年，那一年，安妮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了她的首次回顾展，这是该机构第一次专门为纺织艺术家举办的展览。

安妮的纺织艺术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尊重原材料，根据材料的特性，充分发挥其潜力。二是提倡使用新机器和拥抱新技术，这代表着她不断创新的勇气以及对艺术实验的无尽渴望。三是注重偶然性，通过“即兴编织”进行不规则的几何抽象实践。四是在创作中始终保持一种游戏精神，将自发性和创造性注入高度技术性的编织过程中。这种游戏精神还促使她尝试其他媒介，她曾和自己的学生亚历山大·里德一起，用瓶盖、过滤器和回形针等日常物品创造了富有想象力的反奢侈饰品。五是新旧融合，她从充满活力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原住民手工编织图案中获得灵感，将这些视觉代码结合到现代手工编织中，制作出像字形一样扭曲的循环线。

安妮·阿尔伯斯将精湛的技术与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相结合，让古老的编织工艺成为一种现代艺术形式，挑战了艺术和应用艺术之间的严格边界。在职业生涯中，她还发表了许多关于编织的论著，包括开创性的著作《论设计》(1959)和《论织造》(1965)。有评论家将她那些能够为建筑空间增加结构或形式的纺织艺术描述为“隐身建筑”，这些极具创造性的作品即便在今天看来，也依旧令人怦然心动。

女学热点

从女性友好视角完善生育支持体系

·阅读提示·

■ 庄渝霞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作出“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实施配套支持”的重要决策，构建协调女性职业发展和育儿照料的支持体系是“决定”所秉持的理念。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生育实际出发，认为应立足女性发展与生育支持并重的思路，减轻生育负担，将性别平等观和女性友好视角贯彻于生育支持体系的完善之中。

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作出“实施一对夫妻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实施配套支持”的重要决策，强调降低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在指向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的同时，特别要求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平等就业。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较低生育水平。而关于生育率影响因素的分析显示，女性的双重负担是影响女性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构建协调女性职业发展和育儿照料的支持体系是《决定》所秉持的理念。基于女性发展与生育支持并重的思路，本文提出减轻生育负担、构建生育支持体系的路径，并强调只有将性别平等观和女性友好视角贯彻于生育支持体系构建中，才有望提升生育率。

女性发展与生育支持同时并重

我国妇女发展实践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指导下不懈探索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成果。很多国家透过低生育率这一表象看到了背后女性地位的本质，发现了女性地位和生育率平等推进与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应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把握女性发展与生育之间的关系，从而兼顾二者利益。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妇女发展纲要》提出的妇女发展七个领域中，女性参与经济建设位列第三，它决定着女性参与商品分配的结

果，诸如教育、健康和医疗保障获得的程度，也决定着政治参与、法律出台、婚姻家庭、生育制度等社会的性别平等程度。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两种生产的思想及对社会制度的影响：“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两种生产的制约。”按照劳动价值理论观点，劳动应该从属于社会内部的分工，价值在劳动中形成并在交换中实现。因此，生活资料生产归于公共领域，劳动价值得以体现；人口生产则归于私人领域，家务、生育及照料属于无偿劳动生育价值无法体现，故两种生产长期处于割裂甚至对抗状态。

继之，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点来看，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属性，自然属性隶属于社会属性。女性应该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女人；女性的社会价值通过社会分工和社会劳动体现出来，自然属性(如生育功能)是在保障女性生存权后的自由选择。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两种生产思想、劳动价值理论和人学观点，为女性发展和生育支持建设提供如下判断：第一，妇女必须大规模进入社会生产领域，才能创造劳动价值，故应保障女性充分就业。第二，应彰显妇女的生育价值，消除社会生产与人口生产之间的割裂状态。第三，生育必须从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推进家务劳动(育儿照料)的社会化。

减轻生育负担，积极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费孝通先生认为，生育制度安排是服务于人口稳定和社会的完整需要发展起来的。生育事件确实

存在个人决策与社会需求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生育给女性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性别负荷。

为减轻生育给女性群体带来的性别负荷，构建一个囊括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健康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生育照料四个方面的生育支持体系显得尤为重要。生育保险政策是我国现行生育支持制度中最基础、最长久和最完善的制度安排。在此基础上，生育支持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可分四步进行：第一，做好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在产假和生育津贴基础上，加入哺乳假、父产假、父育津贴、父母假、父母津贴等。第二，加强生育保险制度建设，加强生育保险和生育救助建设。生育保险是指向生育保险未覆盖的城乡未就业女性提供生育补助，生育救助是生育保险安全网的最后一道底线，旨在保障生育保险和生育福利无法惠及的人群。第三，建立生育保护框架，做好生育保险、健康(劳动)保护、就业保护与非歧视之间的政策连接。继续加强母婴保健、生殖健康服务，执行劳动保护和深化劳动禁忌范畴研究，消除就业歧视。第四，推进包括生育保护、0-3岁托幼服务、灵活工作时间安排等举措落地。

只有彰显性别平等，才能提高生育率

近年来，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进一步强调性别平等的重要性，2020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年高级别会议上讲话强调：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界，打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让性别平等真正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从上世纪90年代起，社会性别发展战略取代了妇女参与发展战略，用于指导女性发展和促进性别平等。基于性别平等视角下的生育支持策略，也将从片面强调女性责任转变到强调父亲

参与，从强调女性在家育儿转变到扶持托幼服务，从单纯追求生育率提升到综合考虑女性发展环境。

首先，生育支持体系的构建应该具有社会性别视角。从国际经验来看，家庭政策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巩固了传统性别分工的政策，如产假过长、育儿假主要由母亲休、发放幼儿补贴以便母亲居家照料等；一类是性别友好的家庭政策，比如，适宜的产假时长、父亲参与育儿且不可转让、提供公共托幼服务以及幼儿照料等。实践表明，巩固传统性别分工，单纯追求生育率，很难取得预期效果。只有提高女性地位，改善女性就业条件，才能使女性没有后顾之忧地养育子女。

其次，实施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营造性别平等的大环境。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社会性别主流化定义为：“把妇女和男人的关注、经历作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领域中设计、执行、跟踪、评估政策和项目计划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考虑，以使妇女和男人能平等受益，平等不再延续下去。”在生育支持体系构建这一大系统中贯彻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应着手的工作包括：对产假、育儿假等生育休假及相应津贴进行科学设计，鼓励男性参与；进行生育成本分摊机制设计，进行女性(生育)友好的企业认证制度研究；在城市规划和乡镇建设中融入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女性(生育)友好社区和公共空间清单指标设计和评估。唯有建设生育友好和女性友好的大环境，为育儿提供有效保障，才能最大程度激发家庭生育热情，提高生育率。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
注：本文系2020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合合并后生育保险政策内容扩展和基金可持续性研究”[20BSH051]的阶段性成果